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ERS' FOUNDATION

学术研究系列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

董方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学术研究系列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

董方奎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董方奎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

ISBN 978-7-5622-5047-0

I. ①梁… II. ①董…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政治思想—思想评论 ②戊戌变法—研究 IV. ①D092.52 ②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1516 号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

作者:董方奎 ①

责任编辑:何国梅 范 军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4

字数:379 千字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6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1920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外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可以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 30 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 1978 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 2000 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新版前言

本书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选修课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正式出版后，曾作为本科及研究生的教材。学生知道社会发展的渐进性、阶段性，国情与民主进程、政体变革的关系等原理后，80%以上的学生认识到弄清国情的重要性，认识到确定正确改革之路必须从国情出发，认识到美式民主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也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极大地引起同学们研究国情与政体变革关系的兴趣。“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全国第四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均成批购买此书赠给海内外学者，传播到中国许多大学及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地，受到学者们的好评。广东康梁研究会副会长、梁启超研究专家钟卓安教授来信说：“大作很有特色，对清末政体变革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和新论，可谓正中下怀，以我看，有大作在，小弟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休矣。”《康有为大传》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洪林教授来信说：“尊著立论新颖，结构恢宏，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老专家、贵阳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教授来信说：“阁下对梁氏之研究，独占鳌头，继《梁启超与护国战争》之后，复有此《梁启超与立宪政治》，诚海内外未有之盛事也。”此外，本书第三章的部分内容被《中国教育报》以《梁启超眼中的美国民主制度》为题发表，并获该报“深圳杯”奖。

史家的著述目的不在于听取优美的赞词，而在于是否为社会制作了一个平面的镜子，较为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使治国、治事者以史为鉴时，不致有误。若制造一个凹凸不平的镜子，使治国、治事者所看到的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并以此为依据、决策，那就害了国家、社会，也害了个人。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无疑要肯定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和开创民主共和的重大意义，学者们将从各个方面去歌颂、赞扬，这是应该的。多从正面去肯定、去总结，这也是应该的。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所作的反映应该是客观的、全面的，光辉面要反映，阴暗面也要反映。现在我可否试问，当护国战争胜利后，民国安在？辛亥革命发生一百年了，封建专制真的推翻了吗？为什么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前后，又出现严重的个人专制？明知专制横行，一个个有见识的领导干部在没有经过法律审判的情况下被残害，而数千名高级干部在当时却噤若寒蝉，不敢站出来说不“不”字，这是为什么？

过去史学家曾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封建势力的破坏，帝国主义的阻挠。这种外因论没有说服力。民主人士要求政府给人民以民主，这是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民主的取得不是中央政府的恩赐。民主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这就要求人民有能力勇敢地站出来做主。梁启超曾说“中国不能骤行共和的原因，是由于人民文化素质偏低，没有能力站出来当家做主”，这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方面，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控制政局，需要有见识的政治家拿出合乎国情的政治方案，革命党人中有多少人懂得共和政治？没有。还是孙中山自己认识得深刻。1920年前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和《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等文章里对往日追求共和制进行了坦诚的反思。他说，“我们曾要求学习西方的代议制度，中国一点也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多百十倍，弄到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污秽腐败，是世界各国自古以来所没有的”，“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因此，革命后“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共和的基础，怎么巩固呢？他进一步认识到，“一味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大害的”，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社会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孙中山能够坦诚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我们一般史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直言不讳呢？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掀起的立宪请愿运动，是一个严重超越历史阶段的运动，不少历史学家却指责他保皇、保守。民主政体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也是一个有阶段性的漫长过程。英国的民主制发展最早，远在13世纪时已经有了君主制的贵族国会，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相继颁布《权

利法案》、《王位继承法》，建立起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其权力的中心来源于君主和国会两个方面。随着经济和教育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力量逐渐增大，经过 170 多年的过渡，在历经斗争、斗争、妥协后，取得双赢，民主势力逐渐增大，资产阶级议员控制国会。到 1852 年英国才最终确立主要对国会负责任的“责任政府”（亦称“责任内阁”），成为国会君主制国家。这漫长稳步的改革，使工业革命不断高涨，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经过经济和政治一系列改革和二十一年的立宪预备，于 1890 年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立宪政治，迅速成为亚洲强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1947 年宪法规定成立责任内阁，天皇退居次要地位。日本君主立宪制从 1868 年确立到实行国会君主制，其间有 79 年过渡。清政府在国际国内立宪运动的压力下，于 1908 年开始仿行日本预备立宪，宣布九年预备期及逐年实施的具体方案，计划 1916 年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政治。日本以二十一年预备实行宪政，清政府决定九年实行，且有具体实施方案，应该说有可行性，但有过速的征兆，何况又在立宪请愿速开国会运动的压力下，将预备立宪期缩短两年。但在梁启超的极力鼓动下，国内立宪派张謇、汤化龙、孙洪伊等在谘政院内外及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规模巨大的第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立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实行虚君共和，试图在一夜之间走完英国花费 170 多年、日本历经 79 年的民主进程，不达目的，就将返乡响应革命。立宪派与清政府斗争激烈，各不相让。立宪派已有革命共和派在背后痛斥他们保皇、反革命，因而他们没有退路，只有斗争、斗争、绝不妥协，其结果，只有两败俱亡。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启超追求的仍然是民主宪政，他也是一个民主派，其行为是激进的，极大地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而我们的史学家却硬说他犯了保皇、保守、改良主义的错误。

这样，史学家就把梁启超的像画否了，使后来人们长期把梁启超当作保守、保皇的领头人物大加批判，促使后来的激进、极“左”的思想恶性膨胀，出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斗争高潮，迅速消灭资本主义，宣布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闹得国民经济临近崩溃边缘，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痛定思痛，1997 年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

总结过去失误的根本原因。他说这“就在于那些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他一再强调坚持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性，指出当前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这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对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内极“左”即激进思潮的错误所作的沉痛检讨，以及对未来改革速度所规定的应该遵循的原则。这种态度是坦诚的，理论是科学的。

中共的上述极“左”错误的造成，与我们某些史学家的跟风吹捧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如大跃进时期，史学界掀起狠批“改良主义”、“爬行主义”，以便为那时的“大跃进”理论服务。大跃进的历史错误，中共中央已作了深刻检讨，我们某些史学工作者是否也应有所反省，痛改前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历史学的研究推向高水平，多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民主共和政治建设的新方案，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适度地逐渐加快，促进社会稳步平安地向前发展，早日建成小康社会，用以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确有一个“度”的问题，但是理论上的科学，并不能保证实践中的科学。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指导思想就是社会发展的渐进论和阶段论，但他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曾多次鼓吹激进，在戊戌维新中提出“速变”、“全变”，变法失败后高唱革命破坏，随后又掀起立即实行“虚君”制君主立宪请愿运动等。这些口号推进了20世纪初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却没有得到多少民主政治的实惠。对于梁启超这种实践远离理论指导的历史功绩如何进行评价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从实践脱离理论中吸取教训。在疾风骤雨、白浪滔天的历史洪流中，要掌握历史发展的“度”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万分必要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需要革命领袖具有思想家的前瞻、明察和冷静，政治家的别择、忍耐、果断与策略，军事家的勇敢、冒险和魄力。明确方向，紧握舵柄，稳步前进。

作者

2010年9月27日

初版前言

矢志追求民权宪政的梁启超，在清末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及政体变革的形态进行了痛苦的摸索。根据中国国情的特点，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民主政体，是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曾经研究并介绍了西方几乎所有政治学家的学说，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霍布斯、洛克、边沁、伏尔泰、斯宾诺沙、卢梭、伯伦知理等人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无所不包，兼容并蓄，供国人参考选用，他又对各国政体的发展历史及与国情的关系作了对比研究，在彷徨中试图寻求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方案。他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堪称“中国之伏尔泰”。

在政体的选择中，他毫无成见，总期择善而从。他曾经高唱革命破坏，向往美式民主共和，当他亲赴美国考察后，顿觉美式方案不适于中国；他曾经力主君主立宪，甚至主张经由开明专制而过渡到君主立宪，最终建立英国式虚君共和政体。这种变化，是倒退还是进步，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保守还是稳健？这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此后数十年间，乃至今日，人们一直各执一理，争论不休。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论者在肯定辛亥革命的意义时，大多是从革命先烈的爱国热忱，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从反对封建专制等几个方面去加以说明，同时又指出，历史经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在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进程中，

能否从长期封建专制的，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多民族的国家，一跃而跨入民主共和国，却很少有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去深入研究。

清末社会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凡是复杂的东西都很难精确，精确性和复杂性往往是相互矛盾又彼此排斥的。梁启超在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努力追求民主宪政之中，从狂热鼓吹革命，破坏建设共和政体，到坚决反对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又从积极发动立即实现君主立宪的请愿运动的失败中走向支持和拥护辛亥革命的共和道路。可见，清末民主进程的发展，政体的选择，是人们在这个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彷徨求索的过程。人们在探索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困难，遇到的矛盾又是错综复杂的，历史生活本身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人们在探索民主进程及主张建立何种近代政体的问题上，各有所持，各执一理，后人用不着偏袒、鞭笞。本书作者在论述清末民主进程及政体变革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本着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的态度，力求开辟研究的新局面。

史学家应该诚实、公正、明朗地看待过去，认识过去，认清国情，从实际出发，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使人们正视今天，指导未来。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

由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及研究经历有限，面对清末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颇感力有不逮，不免有舛误之处，请读者教正。

作者于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0年元月

目 录

新版前言	(1)
初版前言	(1)
第一章 对西方民主政体的向往与尝试	(1)
第一节 追求民主宪政的先驱	(1)
憧憬西方民权宪政	(1)
民族危机与改革要求	(7)
议院政治的公开宣传	(10)
第二节 梁启超的崛起	(13)
拜师康门	(13)
崭露头角	(17)
舍言论外未有致力	(18)
变法之本	(22)
声名鹊起	(25)
宜自求为陈涉	(26)
第三节 矢志追求立宪政体	(28)
不断扬弃旧说	(28)
渐进论的初步确立	(34)
时务学堂总教习	(36)
大发民权论及宣传“种族之感”	(38)
议会政治雏形的建立	(40)

新旧之哄起于湘	(44)
非破家不能救国	(46)
第四节 政体变革的设想与尝试	(47)
第二章 力主破坏 倾向共和	(54)
第一节 欲新中国必先新民	(54)
反专制痛斥慈禧	(54)
建立民族国家	(59)
救国必先有权	(63)
欲新中国，必先新民	(66)
第二节 大中华民主共和国	(73)
与孙中山联合	(73)
名为保皇，实为革命	(77)
共同发动自立军起义	(81)
高唱破坏主义	(89)
大中华民主共和国	(94)
第三章 放弃共和 重尚君宪	(99)
第一节 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	(99)
非保教与保教之争	(99)
暴力与非暴力之争	(102)
共和与君宪之争	(103)
第二节 黄遵宪的劝诫	(107)
梁黄友谊	(107)
劝诫与希望	(110)
长者的遗教	(114)
第三节 彷徨求索	(117)
游美而梦俄罗斯	(117)
广为探求，兼容并蓄	(122)
崇尚伯伦知理	(127)
政体比较与国情	(130)
“斯变而非变也”	(136)